

【明清思想经典丛书】

# 明夷待访录校释

〔明〕黄宗羲 著 孙卫华 校释



岳麓書社

明清思想经典丛书

# 明夷待访录校释

〔明〕黄宗羲／著 孙卫华／校释

岳麓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夷待访录校释/(明)黄宗羲撰;孙卫华校、释.

—长沙:岳麓书社,2010.12

ISBN 978-7-80761-585-9

I. 明... II. ①黄...②孙... III. 哲学思想—中国—清代②明夷待访录—注释 IV. B24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4298 号

## 明夷待访录校释

作 者:[明]黄宗羲

校 释:孙卫华

责任编辑:刘文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罗志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5.875

字数:155 千字

ISBN 978-7-80761-585-9/B·59

定价:15.00 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 转型时代经典的魅力

——代丛书序言

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很多经典，而转型时代的经典尤具活力。中国古典时期的周秦时代，出现了一大批经典，后来结集为《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及至晚周时代的《荀子》都可以看做是“周秦之际”转型时代的系列经典。这些经典至今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并逐渐地影响着东亚乃至世界人的心灵。而西方古典与近代之交的转型时代也出现了大批伟大的经典，自意大利文艺复兴到17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在文学、艺术、科学、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均出现了系列的伟大著作，直接影响了现代人类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心灵秩序。略举其中最为著名的著作，如《神曲》、《十日谈》、《政府论》（上、下）、《利维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伦理学》、《新工具》、笛卡儿的《沉思录》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向近现代性质的工商业文明的转型之中，也出现过一系列具有过渡性质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对于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曾经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与激励作用，只是由于近现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大殖民浪潮的冲击下，这些作品长期被湮灭了，直到今天，这些伟大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伟大思想仍然被现代西方文化潮流裹挟的淤泥覆压着，带着灰头土脸的形象龟缩在现代文明的阴暗角落里。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过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大力宣传，特别是40年代以后，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侯外

庐，继后有萧蓬父先生等为代表的学者前赴后继的发掘与阐扬，这些转型时期的思想家与思想逐渐得以被学界所认识。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些转型时期新思想家的著作也陆续被整理出版，特别是一些大思想家的著作全集也被整理出版了，如《王阳明全集》、《李贽文集》、《黄宗羲全集》、《船山全书》、《傅山全书》、《戴震全集》等，这对于我们了解这一转型时期的思想家的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也还有一些遗憾，如同时期的《方以智全集》就迟迟没有出版，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方以智思想的认识。然而，对于这些转型时期思想家的普及宣传工作，似乎还没有展开，而要普及、宣传这些转型时期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思想，就必须有相应的带有普及与宣传特点的著作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认为，岳麓书社出版的这套《明清思想经典校释丛书》，对于普及、宣传这一时期进步思想家的新思想，让更多的人初步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开启了迈向近现代的思想历程，将会大有裨益。这或许可以看做是萧先生的哲嗣萧远兄所说的，要把萧先生的“早期启蒙说”推广为“早期启蒙学”的一种新的尝试与开端。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该套小丛书的立意不在整全，而在于以点带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带有路标性质的符号，让人们通过阅读、了解这几本著作，以一种盎然兴致继续深入明中叶以后步入转型期的新思想园地。

丛书所选的五本著作，将它们称之为转型时期的经典作品，是当之无愧的。即使放在同时期的欧洲的经典作品中，也毫不逊色。按照业师萧蓬父先生的说法，王阳明是中国传统哲学由中世纪向早期近代转化的分水岭式的人物，而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由王学而发展成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之后的何心隐、李贽等人则非传统儒家名教思想所能羁络，恰恰也印证了萧先生的判断。本丛书中选择《传习录》作为丛书的思想起点，是比较准确的。虽然，《传习录》不足以全面反映王阳明的思想，但王阳明的主要思想在其中有生动

的体现。该书由其妹夫，也是他的弟子徐爱整理而成，以问答的形式来展开阳明的思想，对于年轻的学人，特别易于接受。以《传习录》为了解王阳明思想的入门书籍，大抵不错。

在黄宗羲《明儒学案》里，李贽并没有列入王门后学的学术与思想谱系之中，这既反映了黄宗羲的学术见解，也体现了黄宗羲的思想敏锐之处。他从思想性质的根本差异处入手，将李贽判定为“非复名教所能羈络”式的反名教人物，因而逐出阳明学的谱系之外。以今人的观点看，李贽在学术上深受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而且曾师事王艮之子王襞，可以纳入泰州学派。然而，就其思想的批判性而言，他实际上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第一人。在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三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里，李贽是作为传统专制社会“异端之尤”的思想家而得到充分关注的思想人物，而在萧萧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下，1983年版）里，则被定性为16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家，而且，在萧先生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1982年）一文里，将他看做是中国的哲学烈士，类似于意大利的布鲁诺。李贽的著作很多，然而在当时对年轻学子有深刻影响的是《焚书》与《续焚书》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不是什么长篇大论的哲学讲章，而是一些战斗檄文式的书信和短文、读书杂感与政论文，还有少量的诗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如《童心说》、《答邓石阳》、《答耿中丞》、《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等，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启蒙篇章。

黄宗羲是明清之交的大思想家，他在中国哲学史、学术史上的贡献甚大，《明儒学案》开创了我国断代思想史，其写作体例直接影响到20世纪初期冯友兰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写作。然而，就其在中国思想上的独特性贡献而言，我个人认为，他创作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则更有代表性。该书在“万民之忧乐高于一姓之兴亡”的新政治价值理想的前提下，系统阐述了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并赋予了近代的意义。他通过对君道、

臣道、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之不同，以及“君臣共治”天下，只有职分的不同，没有等级的划分等一系列新思想的阐发，并提出以学校为养士与政治议政的场所的新政治构想，这些新政治理想显然不同于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与道家的“公天下”思想，已经走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边缘，至少已经达到了中国式的士大夫精英民主政治的新领地。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早期近代化的新政治理想虽然不同于洛克等欧洲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理想，但就其反对专制政治，提倡民主政治，为更广大的民众谋求政治与经济的利益等要求而言，具有思想的同质性，其中的差异既是民族性的，也有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的先后之别，但似乎都可以纳入近现代民主政治的文化范畴而区别于中世纪——如中国宋元之际邓牧的《伯牙琴》，甚至更早期的如魏晋时期的鲍敬言的“无君论”等反君主专制的异端思想。

《日知录》这本著作，语言相对浅白，思想也比较易懂，表面上看是一些读书笔记与札记，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其实不然。该书中不仅有系列的反君主专制的思想，如卷八中的“封驳”、“守令”条，卷十三的“清议”条等，而且也有一种新人性论思想，如卷二的“言私其纵”条等，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以一种实证的、追求真知的方式来对待经典（包括儒家经典）的态度，对于传统经学在清代乾嘉学术中以知识说经新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开创与引领的作用。更进一步地说，在信仰与知识理性转向的关系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清人笔记类作品中的杰出代表，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都可以看做是深受《日知录》一书学风影响的产物。另外，《日知录》一书重视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来进行学术研究的学术路线，对于转型时代的学术创新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提倡的“循根达杪”、“手披枝肄所歧”以求“十分之见”的追求真知精神，与《日知录》通过反复校订所见，以求真知的精神，若合符节。

相对于上述四位大思想家及其著作的影响力而言，唐甄及其《潜书》在思想史上的影响要稍微逊色一些。然而，作为明末清初一位重要的反专制的思想家而言，唐甄及其《潜书》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中对专制君主的批判，对于各种奴性的批判都是非常深刻的。他不仅有“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震古烁今的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而且还有一系列批判奴性的文章，重视宰相在传统政治中的作用的的思想，有同情妇女，提倡夫妇平等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可以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反专制政治思想相互补充，并且与李贽以降部分进步男性思想家一道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了一股解放妇女的思想潮流。

单就这些著作本身而言，它们都曾经在全集中或者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现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将这五本书放在一起作为一套丛书，恐怕还是第一次。既然是一套丛书，则必有编者的内在想法。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丛书从王阳明开始，到《潜书》结束，隐然暗示着编辑者的一种思想史的考虑，即以王阳明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分水岭，然后着重选择了“明清之际”五位进步思想家带有强烈而鲜明的反专制的思想性著作，似乎以一种路标的形式导引人们对于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初具系统的理解。如果这种理解大致不差的话，则该套丛书就具有了别开生面的意义。当然，由五本书构成的这套丛书远不足以全面反映该历史时期的新思想全貌，但作为一种路标还是可以胜任的。通过对这五本经典著作的阅读，可以引导人们进一步地了解明清之际更加丰富的新思想，从而了解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如何通过传统经典的研读而开创中国文化新生面的精神努力。

本套丛书采用导读与简明的脚注，不翻译，要求阅读者依靠自己的能力深入经典之中。而导读只是一种引导与指路。这既是相信读者，给读者预留了巨大的思想空间，也是尊重经典，以免通过翻译破坏了经典自身的语言风格。



系统阐述这套丛书中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不是本篇短小序文所能胜任的工作。承岳麓书社的美意，给这套小丛书写篇序，择其要而对上述五本经典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作一提示性的说明。由于最近诸事繁多，再加上身体不适，无法有充沛的精力按要求写篇有分量的序，只能以此不轻不重的小文塞责了。

是为序。

吴根友

2009年12月3日

# 前 言

## 一 黄宗羲生平简介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享年八十六岁。浙江余姚黄竹浦人。

黄宗羲出身于官宦之家，是明末东林党人黄尊素的长子。幼小时，他就表现出与众不同，异常聪慧，力大能举鼎，相貌如古人，说话有些口吃，额角上左右各长一个铜钱般大小的红痣。少年时，黄宗羲就曾跟随父亲读书，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好窥群籍，不琐守章句。此时，逆阉魏忠贤窃政，独霸朝纲。于是，党论大兴，黄尊素每与同志论国事时，黄宗羲独在侧侍候，故而能知道朝局清浊。黄宗羲十七岁时，父亲被阉党迫害致死。黄宗羲悲痛万分，读书击剑，伺机报仇。崇祯皇帝登基后，阉宦势败，死于诏狱的忠臣得以平反昭雪。十九岁，黄宗羲进京，为父申冤，与逆阉对簿公堂，用铁锥刺伤魏忠贤爪牙许显纯、李实，于是，名声显于京师。父亲的冤仇被洗雪以后，黄宗羲不分昼夜地发奋读书，《十三经》、《二十一史》、《道藏》、《佛藏》及天文、历算之书，无不涉猎。

为了与阉宦逆党继续作斗争，黄宗羲参加了复社，并被推为领袖。继而清兵南进，黄宗羲在家乡聚集子弟数百人，号称“世忠营”，起兵浙东，抗击清兵。南明小朝廷起用黄宗羲，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等职。不久南明灭亡，黄宗羲不得不返回故里，侍奉母亲，

教授两兄弟读书，开始潜心著述。康熙元年（1662），黄宗羲撰写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此后，随着满清政权的不断巩固，黄宗羲以明朝遗老自居，潜心著述，教书授徒。他先后写出了《孟子师说》、《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明儒学案》等，直至精心筹划撰写《宋元学案》未果而终。

黄宗羲的一生是勤奋笃学、决不停步自满的一生。黄宗羲曾以诗自警：“六家指要灿陈编，每件应须数十年。却恨一生穷目力，自知尚在半途边。”这是何等的风怀啊！一个刻苦钻研的学者“穷年矻矻”，明明知道自己有限的生命难以求得“其涯涘而不可得”的道，但他仍旧笃学不倦，永不自满。黄宗羲能在学术上有那么高的造诣，与其好学不能说没有关系。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问尚书徐乾学海内是否有博学洽闻、文章尔雅可备顾问者，徐乾学告诉康熙，以他所知，只有浙江黄宗羲学问渊博，已经八十高龄了，依然手不释卷。黄宗羲当时是以先圣为榜样，常自比于孔子。他的好学或许离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状态差不了多少了。

勤奋好学的黄宗羲一生，还充满了奇险的色彩。他不同时期的诗文都涉及他充满离奇、布满坎坷的人生经历。康熙元年，黄宗羲在四明山北麓化安山的居所龙虎山堂及其乡中故居皆遇火灾，“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这两句诗是黄宗羲对当时故居遭受火灾以及平生多险的一种真实的心情记录。除了生活处境的艰难，他还面临着可能被清廷抓捕的危险，在当游侠的过程中，他深有感慨：“江上愁心丝百尺，平生奇险浪千堆。”然而，黄宗羲以过人的毅力战胜了种种危险，身处逆境，依然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并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昂扬的精神。作于己亥年（1659）的《山居杂咏》这样写道：“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甘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躺地，岂信人间胜著多！”这首诗反映了诗人避居山中，面对“破被”、

“空锅”，一个豪情满怀的斗士形象跃然纸上。

## 二 《明夷待访录》思想简介

《明夷待访录》一书是黄宗羲于康熙元年（1662）开始动笔，二年（1663）完成的一部政治代表作。此书最初的书名叫《待访录》，郑性在刊刻此书时，根据黄宗羲所写的类似题辞的文字中的讲法，即“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故加“明夷”二字，这是否符合黄宗羲的本义，目前学界仍聚讼不已。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个题目基本上被广泛认可。“明夷”是《周易》第三十六卦，下离上坤，象征“光明殒伤”。《周易正义》说：“此卦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亦‘明夷’之义也。”明夷卦以“明入地中”为喻，展示了政治昏暗、光明泯灭之世的情状以及“君子”自晦其明，守正不移的品质。卦辞“利艰贞”之义，强调在艰难中维护正道，在“自晦”中期待着转衰为盛，重见光明。题名《明夷待访》正说明黄宗羲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政治昏暗、光明泯灭之世。他虽然期望“箕子之待访”，但他所期待的待访对象，并非像章太炎所认为的是清朝的皇帝。若像章太炎所说，黄宗羲多次力辞朝廷的征召就不可理解了。

黄宗羲生活在经学的独断论传统之中，这种传统以儒家宗法伦理与君主专制构成了一体化的结构，它以崇圣观念为主要标志。要突破这种传统，必须对维护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及其理念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颠覆。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深刻反思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诸多弊端，他反对君为臣纲，倡导君臣平等，共治天下；反对以君为主，天下为私，倡导天下为主，天下为公；反对天下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倡导以学校的是非为是非；等等。他深刻揭示中国传统政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结合传统政治中的先进思想，对崇

圣观念提出了质疑。以往儒家往往用“格君心之非”、灾异儆戒等方式来制约君主的权力，而黄宗羲则抛弃掉这套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做法，设计了具有近代民主政治特征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做法去制衡君权，从而建立起“以万民福祉”为目标的政治观念。黄宗羲所构想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与自秦以来的历代王朝所使用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君主专制王朝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是法家的一整套理念，是为了保证王朝内部权力均衡而设计的，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王朝政权的稳固，其权力的总舵手是君主，其服务的对象亦是君主。黄宗羲设想的以权力制约权力则是具有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一整套新理念，它既不属于法家，也与儒家观念不同。它是以“天下万民的忧乐”为旨归的，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天下万民的幸福安康，其权力的总舵手是民众自己，其服务的对象也是民众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构想的一种以士人中心，由庶民普遍参与的、具有平民化倾向的、“天下为主”的政治蓝图，无疑是一种崭新的新型政治蓝图。这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 1. 提出“君为客”、“天下为主”的思想

《明夷待访录》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即“天下为主”。在黄宗羲之前的一千八百年里，专制君主们均把天下视为自己的财产，正如刘邦对其父所说的“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在黄宗羲看来，天下为家（私）是有悖于儒家的思想传统的。《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睦修信。”孙希旦如此解释：“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也。”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的时代恰恰是在三代以上，而黄宗羲多次将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作比较，以借古喻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黄宗羲“天下为主”思想是针对以皇帝“一家之私”统治天下的历史事实而言的。从思想渊源的角度看，这一思想来自于传统儒家，但又不完全与传统儒家思想相同。在早期儒家那里，“天下为

公”是作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最高社会理想而出现的，它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在黄宗羲的政治构想中，“天下为主”是一种以士人为中心，由庶民普遍参与的，具有平民化倾向的新型政治的核心精神。黄宗羲将其作为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构想了具有近代民主启蒙意义的政治制度。它已经不再是远期的理想社会蓝图，而是作为一种应当的社会形态。

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与传统的崇圣观念相联系，是圣人统治下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主要靠圣人的无偏私而实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思想与他的“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人性论相联系，在充分满足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自私自利的需求以后，达到“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理想状态。它不需要圣人的治理，摆脱了圣人权威的奴役，而与现代的公民社会有更多的相通、相似之处。

## 2. 提出“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平等思想

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是以尊卑等级为前提的。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社会成员被划分为尊者与卑者、主人与奴仆这样相互对立的两极，他们之间是服从与被服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无平等可言。

“三纲五常”作为君主专制政治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中蕴涵的等级观念造成的不平等，给天下万民带来无穷的伤害，它是君主专制的总根源。黄宗羲清醒地看到这点，他猛烈地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表现出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罗网的勇气。他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等一些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具有现代意味的平等思想。他的关于君主专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反思极具叛逆色彩，可以说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

黄宗羲从人性出发进行考察，认为古之人君和古之民在人性的起点上讲都是平等的。分析许由、务光、尧、舜、禹等各自为君的

不同结果，他得出了“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的结论。在他看来，好逸恶劳是人的共性，并不存在谁比谁天生德性高或劣。这种人性论思想是对把君主的德性天然地看做高于民众的说法的一种反动。在很大程度上，它动摇了君主之所以为君主的伦理基础，是从新的人性论角度对君主专制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彻底否定，并动摇了专制政治与等级制的人性基础，具有深刻的反专制性质和较朦胧的近代民主意识。

### 3. 提出君臣关系与传统伦理相分的思想

君主专制的社会有一整套完整地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的特点是：以儒家的血缘亲情为基础，表现出“家国同构”的格局。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个人离开群体难以生存。于是，有着一定血缘关系的人群往往几代几十代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在这些聚居的地方，依靠尊者、长者、辈分进行统治的宗法制模式逐渐形成。到周武王克商以后，封国建邦，等级制国家中的等级名分确定，宗法制最终形成。宗法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经过儒家的理论努力被确定了下来。早期的儒家为这种需要设计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统治模式。在“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的政治模式中，其伦理基础实质上就是血缘伦理。这种统治模式在《大学》一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在于齐家，而齐家则首先在于修身。为了达到修身的目的，《大学》中还阐明了一套修身方法。这样长者、尊者就可以依靠自己辈分、年龄对晚辈、年幼者进行管教。在这种独特的政治格局中，家中的家长，辈分最高的老者往往是家中的最高统帅。以此类推，在一个家族中就会有一个族长，他是这个家族的权威或最高统治者；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国君成为各诸侯的总家长。家长或国君既是最有力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又是最具修养的伦理力量的代表。他们既是政治统帅，又是道德楷模，“君师合一”了。

黄宗羲考察历史时洞见到人君虽然是政治统帅，但并非是道德

楷模。在考察君民关系时，黄宗羲认为，君主的职责本应当是“为天下兴其利而除其害”，而事实却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君主丧失自己的职责，君师并非合一，这样用父子关系来比拟君民关系就不恰当了。黄宗羲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出发，构想了君臣“分治之以群工”的新的政治理想，坚决反对用父子关系比拟君臣关系。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它们不具有实质性的共性。黄宗羲把父子之间的自然伦理关系与君臣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宗羲已经从“家国同构”的传统政治思想中走出来了，打破了将政治社会关系看做血缘关系的传统观念，意味着天下为家（私）的政治模式结束。黄宗羲构想的“天下为主”的政治，它是新伦理为基础的、初步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识的新型政治，它含有用契约关系代替血缘伦理关系的思想倾向。新型政治中暗含的君臣平等思想意识预示了中国社会将走向近代的历史方向，在精神努力的方向上将指向现代的公民政治。

#### 4. 提出“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民主议政思想

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价值判断的优先性而相对轻视事实判断，往往容易导致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相混淆。在君主专制社会，“定一尊”是君主“自为非是”的前提。天子的言行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道德领域的是非也以“一尊”为衡量尺度。这几乎成了一种不可更改的铁律。

黄宗羲对一千八百年来一直奉行的标准问题重新进行审视。他提出了“公其非是于学校”的观点，也就是说，朝廷欲施行某种重大决策，需要交给学校集体讨论，学校议政的成员不仅仅包括士人，还有大批庶民，他们共同议政的结果将决定其是否可行，可行则取，不可行则去。其最终所采用的评判标准是以“公论”为准，而不以君主的是非观为准。这种设想表现出黄宗羲政治思想中的平民化政治的倾向。实际上，学校议政方式是对宋代所开创的士大夫与君主



共治天下的精神传统的继承和拓展。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公其非是于学校”理论还比较粗糙，但在尚未引进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前提下，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黄宗羲能够提出如此具有较强民主意识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天才构想力的政治方案。

以上几点只能概括黄宗羲政治思想的主要特质，而非全部。其表达方式是古色古香的，但其蕴涵的思想已经表现出了冲决罗网的超时代特征。说它古色古香，主要是因为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依然以三代以上、三代以下相比较的形式出现，仍然是使用公与私、利与害、治与乱、本与末等一系列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论范畴建构起来的，似乎未能走出传统的泥淖。但是，如果从黄宗羲对待三代以上所谓的圣君的态度考察，就会发现其中实质上的区别。在黄宗羲看来，尧、舜、禹与常人无异，都有“好逸恶劳”的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理解黄宗羲政治思想与传统政治思想的区别呢？传统中有许多东西是以神话的形式显现给世人的，其神圣性具有无上权威。三代以上的统治就是中国古人的神话。黄宗羲一方面力图冲破传统的偏见，另一方面又要借助传统为其论述寻找其权威的支持。故仍旧采用传统叙述方式来表达与传统有较大冲突的思想，在策略上是比较稳妥的，也是容易被人接受的。职是之故，我们不可被其思想中的传统形式所蒙蔽，应在相同语言的背后寻觅所要表达的“意义”，这才是我们能否正确把握黄宗羲政治思想中超越时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内涵的关键之所在。

有学者习惯于把没有否定君主政体当做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局限性而加以批评。实际上，这是受现代民主政治思维定式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以西释中”的诠释方式。即使按照西方思想家的观点，民主政治也不是最优的，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民主政治若没有很好的教养，就会变成暴政。它和君主制、寡头制、贵族制等作为政治体制，各有优劣，无所谓谁更为先进、更为落后。在发达资本主义